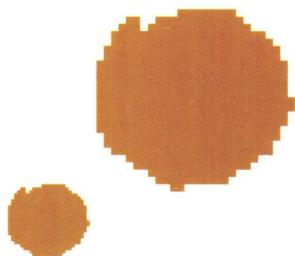


2017.02
43

反叛之路

程文超◎著



程文超文存 7

反叛之路

自序

1993年7月13日一早，我与妻子乘坐的火车到了广州。那是我们第一次踏上南国的这片土地。一切都显得新鲜。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流，登上了203路汽车。随着汽车的启动，广州一步步向我们走来。街道是狭小了些，摩托车却如蝗虫。路过一条水流，人们说，这就是珠江。哦，我应着。心里多少有些失望，它与我心中的“江”有些不相称。在中山大学南门外下了车。天上正下着雨。为躲雨，也为充饥，我们在外面小吃店吃了一碗面。天还早，人不多。雨在顶棚上丁丁东东地响着，衬出几分幽静。那场景，有点像20世纪50年代的电影。

一边吃着，我一边看着中山大学的校门，心里有些异样的跳动，东漂西流地过了三十多年，如今，我准备在这儿扎一个安稳的“家”了。可是中大，你是个什么样子呢？

吃完面，雨也停了。我与妻穿过马路。走进中大。参天的古木静静地排在校园，树叶下雨点滴滴答答往下掉。不时有一蓬或几蓬青竹，火焰般绿着。整个校园洗过一样，鲜鲜的、青青的、幽幽的。我与妻交换了一下眼光。不错，我说。真不错，妻说。

我们被安排在爪哇堂315号住下了。这是一间20平方米大小的房子。我们用一半作了卧室，里面放了两张床，我们的，和我们女儿

的。一大一小，紧挨着。一张布帘，隔开另一个天地。在另一半的天地里，我放了一张书桌。书桌的左边，是一台 25 英寸的彩电和一套音响，右边是几张沙发，沙发前面，也就是我的椅子后面，是一张小茶几。还有一块地方呢？堆书。书是打不开的。在北京时是怎么捆着还是怎么捆着，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于是，我的工作室、女儿的学习室、客厅、餐厅、储藏室，都有了。这个方寸天地是个真正的“多功能室”。一到晚上，我占着书桌看书写字，女儿在茶几上做作业，妻子还可以坐在沙发上看看电视。一家人，其乐也融融。对了，还有一个“功能”没介绍——蚊子的卡拉OK 厅。那里蚊子多。一到晚上，蚊子更是聚集在一起，一边放声高歌，一边把我们当点心吃着。我们有时点上蚊香，有时干脆钻进蚊帐里，与蚊子和平共处。

房子是小点，希望却在。（学校有关部门告诉我，这里只是过渡，等两个月后正式给我们分房。果然，等了六个“两个月”之后，我们搬家了。）而且，那真的是一个很有情调的住处。现在，住在三室两厅的房子里，将那些“旧事”往电脑里敲时，我仍然很留恋我的爪哇堂 315 号。爪哇堂是一座红砖砌就的三层楼房，四周都是树，旁边便是中山大学中区的大草坪。一早，你打开窗户，涌进的空气很甜、很香。吃过晚饭，一家人走下楼来，在草坪周围散步。和风徐徐，一天的疲劳也就随风飘逝了。特别不能忘记的是 1993 年中秋节。那晚我们一家出外赏月。一下楼，全呆了——偌大的草坪上，满地的红灯笼啊！那灯笼，把青青的草苗、如水的月色全铺上了一层醉人的红。这画面来得太过突然，来得我们毫无准备，我们全被“镇”了。于是一家人全变成了小孩。迅速买了一个小灯笼，三个抢着玩儿。提着小灯笼，在大红灯笼中穿来穿去。很晚了还舍不得回家。以后每次下楼，眼前便出现青草地上那一片红。

我的窗外，是一棵龙眼树。平日，绿枝掩映，树影婆娑。结果实的时节就更好玩儿了。你看着它从一个个小蕾儿慢慢地长。第二天与前一天，似乎没什么变化，可隔几天一看，竟长大了一点儿。原来它

是那么镇定，不慌不忙，却胸有成竹。渐渐地，真长大了，仍然是那么不起眼，丝毫没有张扬或者招摇的意思。于是，你每天都忍不住要看它一眼。当它终于长成成熟的龙眼时，你简直觉得那是你的作品一般，是一个由你的感情投射的产品。

仔细想，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你每天的观照、你的心血参与了它的成长？但它只是长它的，与你无关。你明白了，你有一种东西在与它一起成长。那是一种心态，一种宁静、淡然的平常心。我想，人要是做到龙眼那种神闲气定的样子，不容易，可你得学。人生，道路不可能一马平川。有了一点艰难，这样的或那样的，不要把自己的前途想得太伟大，以至于对生命悲观失望。人生，也不可能不做一点儿事儿。有了一点成绩，大的，或小的，也不要对自己的那点事儿太当一回事儿，以至于飘起来，连日常说话都用显示身份的语气，透着满肚子学问。平常人，用平常心，过平常日子，多好。

也是从住在爪哇堂起，我开始了“对广东的阅读”和“在广东的阅读”。我对广东作了不少阅读：广东文学、广东文化等等。读了，有时便写下一些感受。有人说，广东人，本来就爱关起门来自夸，你从北京来，何必助长这种“传统”？我有时笑笑，有时做些解释。我想，干我们这行的，其实主要不是为了夸一下什么或批一下什么，而是要说说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谈广东、或是谈北京，谈一部作品，或是谈一个文学现象，都只是一个谈论对象，并不是我们的谈论目的。目的是要通过谈论对象来谈谈我们想谈论的问题。对象是材料，问题才是题旨。我对广东的阅读，其实只是我“在广东的阅读”的一部分，目的是要读中国。对我来说，广东的许多新的文学、文化现象，是对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冲击和反叛。我不否认我对广东文学和文化进行了一些精神性的挖掘，但我要谈论的恰恰是中国，是中国文化的重构之种种。

在这些谈论中，我不否认欲望。第一，我不认为欲望只是物欲、肉欲，精神需求同样是人的欲望。第二，我以为，建在高空的“精

反叛之路

神”再伟岸，都无济于中华民族的文化重构。把“欲望”抽空了的精神还是不是真正的“精神”，是需要讨论的。只有正视人的欲望，利用欲望系统的张力，才能真正找到新时代文化的生长点，为个体建立精神家园，为社会建立精神秩序。

面对欲望的过程，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阵痛的过程。阵痛总是要付出些代价。这个代价对我们这些从事人文工作的文人来说可能更明显。既然历史无法回避，你就得认了。我也常常嘲笑自己，一介书生，却不乏“崇高”情怀。自己的生计未必很如意，却想着为民族未来承担阵痛，并麻起胆子想中国文化重构的生长点。

情怀崇高不崇高且不管它，自己是一介书生确是记得的。书生就是书生，就是读书、写字。这读书、写字你也不要把它看得太高，只是你的一种生存方式。对你的这个生存方式，你得有点平常心，犯不着为自己规定，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犯不着为没能“怎么样怎么样”就沮丧；也犯不着为社会和他人规定，一定要对我的东西怎么看怎么看；更犯不着为社会和他人对你的东西“怎么看怎么看”时就生气。我喜欢魏晋时期的文人——这话说起来有点附庸风雅的味道，那种生存境界我达不到。当然，达不到归达不到，私下里喜欢还是可以的。我读书写作，只想证明作为一个文人的我，活着，而不是千方百计地显示，我是一个活着的“文人”。因而近几年也养成了一点怪毛病：不喜欢赶热点。我不会为别人的思考改变我思考的轨道。我只读我喜欢的书，想我关心的问题，说我想说的话。我关心的问题，有可能成为热点，大热或小热，也可能一辈子都热不起来。这都不重要——热了，我没有必要回避；不热，我没有必要追求。重要的是，我想过，说过。这就够了。

于是便有了这本书。

目 录

第一辑 现代性与 20 世纪中国

面对“现代性”.....	(3)
说一回“后现代”.....	(8)
走向“现代”之路	(25)
“人文”与“后学”:世纪之交的碰撞.....	(36)

第二辑 欲望与诗情:我看第三种批评

世纪之交的寻找

——我看第三种批评	(45)
欲望的重新叙述	(51)
直面欲望:寻找幸福的策略.....	(60)
寻找“彼岸后叙事”	(65)
走向“彼岸后叙事”	
——何继青的小说世界	(70)

反叛之路

欲海里的诗情守望	
——我读张欣 (86)
叩问之下：文学批评的另类	
——关于黄树森的意义 (103)
欲望与文化重构	
——寻找当代文学“第三种声音”讨论之一 (113)
此岸诗情的可能性	
——寻找当代文学“第三种声音”讨论之二 (128)
走出夹缝天地宽 (140)
中国流行文化中的权力关系 (146)

第三辑 叙事的时间与心灵的空间

时间秩序回到叙事之后	
——谈“现实主义冲击波”修复故事的努力 (159)
共和国文学范式的嬗变	
——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叙事 50 年 (175)
品味游子心 (186)
在言象结合中拓展意义空间 (193)
疏离与叙事：广东文学创作之我见 (197)
“同谋”与对话：广东文学策略一窥 (202)
曲与直、今与昔：90 年代的影视诉说 (207)
文人心灵的巨大浮雕	
——读刘斯奋长篇《白门柳》 (225)

第四辑 寻找新的文化支点

他们从历史深处走来

- 也谈近时期女作家的崛起 (233)

- 女性写作的多种可能性 (238)

悲伤 自我 自我实现

- 新时期女作家对人的问题的思考 (252)

- 我看先锋与后先锋 (265)

- 价值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267)

- 南国有风铃 (270)

- 雅俗之间 (276)

- 实话实说:匮乏的丰富及其他 (286)

- 文学课堂里的深刻与生动 (294)

修辞、支点、诗与成熟

- 广东理论写作三题 (299)

打开形容词之外的思维天地

- 记沪粤两地文化发展研讨会 (309)

- 我看理论创新 (317)

- 推荐《20世纪中国文学史》 (322)

- 把握“今天”:作为一种叙事态度 (324)

开放地区的文化成果

- 读《走向开放的道德》 (327)

关不住的春色

- 读第三届澳门文学奖参赛小说 (330)

- 华文文学圈:策略与意义 (337)

- 知识分子的角色焦虑与世俗化时代的精神承当 (342)

文学：给我一个支点

——20年文学思潮浏览 (358)

寻找新的文化支点

——新时期文学思潮管窥 (362)

第五辑 叩问珠江千古梦

“文化”对“眼光”的叩问 (381)

“彼岸”后文化景观

——广东当下题材电视剧琐谈 (385)

边缘的精灵

——广东文化中的平民性 (400)

珠江：千古文化又一川

——谈电视剧《情满珠江》的选择 (410)

“门槛”上的故事

——读李逊《坐在门槛上的巫女》 (414)

《梅花魂》的叙述特色 (418)

广东：呼唤叙事特色 (421)

论陈国凯长篇《一方水土》的跨文体写作 (423)

令人灵魂战栗的人生过程

——萧殷的文学创作 (430)

第一辑

现代性与 20 世纪中国

面对“现代性”

20世纪90年代，“现代性”成为人们不断谈论的话题。中国20世纪的现代性追求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反思对象。

19世纪末，中国人开始追求现代性；又一个世纪末，中国人把“现代性”送上了文化的审视台。中国的现代性是不是在一个世纪之内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

反思并不轻松。面对现代性，中国人并不只有智性行为。荣也罢，辱也罢，现代性毕竟伴随中国人走过了整整100年。100年，中国人告别了古典，走进了“现代”。走得那么豪迈，也走得那么艰难。中国人100年的血、100年的泪、100年的抗争、100年的奋斗、100年的失败、100年的胜利，剪不断、理还乱，是几句话说得清的吗？

然而，还得说。不只为了20世纪，更为了21世纪。

—

“现代性”最初不是中国人的产品。“现代性”这一术语最初也不是中国人的术语。

何谓“现代性”？这个问题西方人问了几十年。哈贝马斯问过、

利奥塔问过、福柯问过，西方后现代语境中大多数杰出的思考者都问过。他们以对“现代性”的追问为入口来谈论后现代主义。因而可以说，有多少种对后现代的谈论就有多少种对“现代性”的理解。后现代的庞杂与不统一给“现代性”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因而论述现代性的书籍已车载斗量，但要用几句话给“现代性”下个定义却不容易。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那神秘面纱后的那些庞杂里，没有一些基本的东西可以谈论。现代性，通俗说，就是摆脱古典，使现代成其为“现代”的性质。按意大利学者瓦提摩的看法，现代性就是“现代”成为价值，不仅如此，而且是“现代”成为时代一切价值的本原。^①

“现代”成为价值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告别古典，面对旧秩序的崩溃。因而“现代性”给予我们的首先是历史的转折。西方中世纪的终结是这种转折，中国封建帝制的解体是这种转折。一种文明落山了，另一种文明升起了。落下去的是古典，升起来的是“现代”。

且不说西方对现代性的阐述、争论如何，我们关注的是中国。中国的现代性自然不是西方的现代性。但中国的现代性又与西方的现代性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经历了告别古典的历史转折，走向了对“现代”的追寻。在告别古典的过程中，中国孕育着自己的现代性。中国对古典的告别有三个因素值得注意。第一，它面对的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和超稳定结构的封建帝国。在中国的古典社会，对人形成统治的，不是西方的神，而是中国的人伦。这就决定了中国人走出古典，走向现代的路与西方并不能完全一样。第二，中国告别古典、走向现代并不是主动的，而是被迫的。中国要么消亡在列强的炮口下，要么崛起在国人的抗争中。中华民族选择了第二条路——中国人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觉醒了。第三，中国人在告别古典时，面对着西方走向现代的大量话语，这是他

^① Gianni Vattimo, *The End of Modernity*, Polity Press, 1988.

们摧毁古典的现成武器。

这就决定了中国现代性的两大元叙事：民族主义与启蒙理性。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反抗封建愚昧、追求民族强盛、人民幸福自由的一种特定文化思路。

中国人最初的觉醒是从民族主义开始的。在民族危亡之秋，国人终于看到，要振兴中华民族，必须改变（改良或者革命）封建帝制，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在寻求救国的道路中，国人也从“器”的层面逐渐深入到了文化，看到了启蒙理性。民族主义与启蒙理性是二位一体的。前者是总主题，后者是到达的路径。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二者统一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与启蒙理性这个二位一体的运作，就构成了中国 20 世纪现代性的足迹。

二

哈贝马斯曾将西方的现代性称为一项未竟的事业。在他看来，启蒙理性的工作尚未完成，生命尚未结束。“后现代性”是不可能的。因而他说，“我并不想放弃现代性，也不想将现代性这项设计看作已告失败的事业。我们应当从那些试图否定现代性的想入非非、不切实际的纲领中认识到失误”^①。哈贝马斯的观点受到利奥塔等人的批判。利奥塔认为，传统知识的合法化已经失败，哈贝马斯的观点仍建立在失效的元话语基础上。

西方的现代性是否已经结束，还是留给西方人去讨论。我们要提的问题是，如何面对 20 世纪中国的现代性？这里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理论前提是：话语与语境的关系。任何话语都必须在一定的语境之

^① 哈贝马斯：《论现代性》，见王岳川等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中才具有价值与意义，也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之中才能被评价。脱离了一定的语境，话语便失去了生命。我们不能对没有任何语境的话语进行专断式的评价。历史语境不同，同一话语会产生不同的价值、意义与功能。比如，“民族主义”于西方已经在大多论者的使用中成为一个贬义词。这与西方人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思密切相关。但弱小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否一概在该“贬”之列，就大可讨论了。晚清以来，由于落后，中华民族成为列强的猎物。如果不救亡图存，中国将被瓜分，成为众多帝国、强权的殖民地。在俯首称臣、成为“殖民主义”的牺牲品与奋起反抗、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之间，中国人选择了后者。这是一条鲜血与生命铺就的道路。多少仁人志士在这条路上写下了生命的悲壮与辉煌。中国人确实“拿来”了西方的“民族主义”，确实具有了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但是，中华民族这样的弱小民族的民族主义觉醒，恰恰是反抗、颠覆强权民族的民族主义的有力行动！

启蒙理性是中国人寻找到的反叛封建的有力武器，是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如果说在西方，启蒙理性已经走向了深渊，它本身的深渊性便是产生后现代的深层原因的话，那么在中国，启蒙理性仍在路上。中国不仅没有走向后现代社会，而且还有很多不“现代”的东西，中国的“前现代”还有着相当的地盘。

因此，当我们回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从维新变法到新文化运动几代先驱孕育、推进中国现代性的业绩时，我们深怀敬意。当我们面对今天中国现实时，我们不得不说，现代性在中国，确实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它还需要中华民族不懈的努力！

三

那么，对中国 20 世纪的现代性就不需要反思了？不，恰恰相反。

然而，我们为什么要反思现代性？

是因为西方的现代性出了问题？是的。西方的现代性确实出了问题——这一点已无须我们再作讨论，而中国的现代性是学习西方的产物——这一点也无可否认。“现代性”无疑是需要反思的。但不同国家、地区现代性所产生的具体问题却并不完全一样。由于语境不同，西方现代性的问题未必一定是中国现代性的问题。我们并不能立足于西方来反思中国的现代性，不能将西方人对现代性的反思一一套在中国的现代性上。

是因为要反抗西方话语中心？20世纪以来，中国确实一直在向西方学习。但向西方学习并非一定要导致西方中心。这需要历史的具体的分析。鸦片战争之后，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目的恰恰是反抗西方强权。当然，不能否认中国20世纪在向西方学习的路上，出现过以西方为中心的人和倾向，但我们却不能以偏概全，不能说一学西方就对。今天的世界，确实没有人能将“中心”的权利垄断在自己身上，但今天的世界也早已不是封闭的世界。

我们反思现代性是因为我们需要寻找一种现代性的自觉，我们需要尽量避开西方人的陷阱，我们需要一种具有反思意识的成熟的“现代”，我们需要探索中国的现代性之路。

于是问题转化为：我们如何反思中国20世纪的现代性？或者问：我们以什么样的话语姿态去反思中国20世纪的现代性？我们该如何进行我们的文化选择与文化创造？

这是一个艰难的课题，是世纪末的中国人无法回避的课题。

原载《东方》1998年第11期复刊号